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126
主管: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主办: 新华书店总店
协办: 中国图书馆学会

新华书馆报

CHINA LIBRARY WEEKLY

馆社之桥 人文之魂 阅读之美 书香之园



第564期

00 03-564

总第686期

2021年8月27日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第26期

02 特别关注

文化和旅游部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

03-04 业界动态

解读古文献中的“飞天来客”讲座在首都图书馆举行

《德清文学百年卷1921-2020》在莫干山首发

北碚图书馆有序开展民国文献编目工作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出版成果云上展在烟台图书馆举行

05 业务交流

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的存藏利用

06 业界观察

对“书院热”“国学热”的冷思考

07 理论园地

李大钊珍贵演讲影像及相关文献研究

08 图书推荐

中华民族史料的编纂适逢其时

——“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全四十册)出版

本报顾问

谭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聂震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饶权(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
彭斐章(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吴慰慈(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本报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波(《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
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媛(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秘书长)
白雪华(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刘小琴(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刘兹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刘惠平(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
任竞(重庆图书馆馆长)
孙月沐(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朱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刘宇松(贵州省图书馆原馆长)
汤更生(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长)
肖维平(首都图书馆党委书记)
何光伦(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
吴晔(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
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
张久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书记、主任)
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李东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东莞图书馆馆长)
李学谦(中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主席)
李国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李勇(河北省图书馆馆长)
李玉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杨建忠(化学工业出版社社长)
杨沛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
邱冠华(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陈超(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陈锐(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陈传夫(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陈胜利(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
陈源燕(中宣部原出版局研究员)
周云岳(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宗俊峰(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林鹏(科学出版社总经理)
林旭东(安徽省图书馆馆长)
范并思(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教授)
郑智明(福建省图书馆馆长)
倪晓建(首都图书馆原馆长)
柯平(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赵俊玲(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贾庆鹏(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
徐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徐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索传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郭斌(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主任)
顾森(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褚树青(浙江图书馆馆长)
蔡继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
霍瑞娟(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魏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本报投稿邮箱 tushuguanbao@126.com

本报虚假失实报道举报电话 010-88361919 转载本报文章 请与本报联系并注明出处

加强非遗保护顶层制度设计 文化和旅游部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化和旅游部负责同志就学习贯彻《意见》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意见》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党中央支持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着力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代接下来、传下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手工艺保护和传承。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一批珍贵、濒危和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社会广泛参与、人人保护传承的生动局面初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一些项目的传承存在困难,依然存在后继乏人的问题,保护工作基础相对薄弱,政策保障力度和机构队伍建设亟待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整体水平与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的地位还不相称,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还有短板差距,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顶层制度设计。

问:《意见》对做好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哪些基本要求?

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做好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牢牢把握正确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项工作符合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民的价值准则,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正确方向。

《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各界关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要坚持依法保护,广泛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执法监督检查。要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内涵,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价值,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问:怎样理解和落实《意见》提出的“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

答:经过10多年来的不断探索实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系统性

保护的新阶段。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把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必须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坚持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强各地各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不断完善基础工作制度,自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全局性统筹谋划各项政策措施,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and 战略布局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相承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要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完善调查记录体系、代表性项目制度、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区域性整体保护制度、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和理论研究体系。要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加强分类保护,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合理利用,加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要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普及力度,促进广泛传播,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外和对港澳台交流合作。

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意见》有哪些安排部署?

答: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在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必须努力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战略性资源的重要性,持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切实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促进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量。

《意见》提出,要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立区域保护协同机制,加强专题研究,举办品牌活动。要在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加大脱贫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支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要积极推动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交流合作,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增进文化认同、维系国家统一中的独特作用。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有效保护前提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高质量量发展。

问: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30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2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意见》从哪些方面进行了衔接?

答: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目前,我国已设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意见》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重大决策部署,明确要继续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落实有关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促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效衔接,提高区域性整体保护水平。此外,为积极应对城镇化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挑战,涵养文化生态,培育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的土壤,《意见》还提出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城市建设相结合,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村镇、街区,全面推进“非遗在社区”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设施是传承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阵地。目前,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安排经费约14亿元,支持各地建设了19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有力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有效促进了当地居民就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设施类型和功能比较单一、社会资金参与不够等问题。为此,《意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设施的建设类型、主要功能等作出规范,提出要形成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传承体验中心(所、点)等在内,集传承、体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传承体验设施。研究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管理制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备案和评估定级制度。

问: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队伍建设方面,《意见》有哪些具体举措?

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新兴文化事业,总体上底子薄、基础差,特别是机构队伍建设亟待加强。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扎实推进,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在文化和旅游厅(局)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31个省(区、市)均设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全国共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机构2400多个、工作人员达1.7万余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在市、县层面,由于大部分地区都缺少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很多人员都是兼职从事这项工作,现有机构和人员队伍与日益繁重的保护任务不相适应,基层的一些传承实践活动也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管理,制约了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效开展。

为此,《意见》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法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职能部门,统筹使用编制资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量与其承担的职责和任务相适应。同时,《意见》还从人才队伍能力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职称评审、智库建设、表彰奖励等方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队伍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

解读古文献中的“飞天来客”讲座在首都图书馆举行

本报讯 跨越千年，观星对话。每逢七夕佳节，民间必不可少的一项传统习俗便是——观星。在不久前的七夕节，来自天文学、古文献学方面的学者，为广大网友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直播对话活动——解读古文献中的“飞天来客”，为七夕观星带来了新视角。

8月14日，由首都图书馆、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共同举办的“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解读古文献中的飞天来客”人文科普知识讲座在首都图书馆顺利举行，这也是首都图书馆“晒书节”系列活动之一。自2019年以来，每年

晒书节首都图书馆都会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服务大众。

参与讲座的嘉宾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黎耕博士和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总经理助理、数字人文副主编朱翠萍博士，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史丽君博士担任主持。讲座中，两位学者以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中文音译昵称“拉索”)有关蟹状星云的新发现为线索，展开了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对话。蟹状星云作为现代天文学研究中最重要

的星体，创造了多个第一，而其中一个第一便与中国古籍密不可分。

1054年，中国古人观测、记录的“天关客星”，正是一颗超新星，其爆炸后形成的遗迹就是今天的蟹状星云。作为银河系中第一个被发现的超新星遗迹，《宋会要》《文献通考》《契丹国志》等多部中国古籍准确记载了其爆发的年份，并包含对其位置、大小、亮度等方面的描述，因此蟹状星云又被世界公认为“中国超新星”。

珍贵的古籍文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我国古籍在天文学方面的详实记载，为现代科

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也凸显了古籍保护、古籍整理的现实意义。朱翠萍博士回顾历史，梳理了古籍中对于客星的记载，总结出中国古籍天文记载“早、多、独”的特点，带领观众认识了古籍的浩繁以及古籍数字化对于古籍利用的价值。

黎耕博士则立足现在，对“拉索”的最新发现进行科普，并用科学的眼光解读古籍中有关“天关客星”的记载。谈及古籍对于天文学研究的意义，黎耕博士指出中国古籍的相关记载不仅极具科学价值，还有很大的传播价值，我们应该辩证地

看待中国古籍中的天象记录。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古籍中的天文记载值得我们当代人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他希望通过建立数据库的方式，将古籍中的天象记录进行科学“转译”，为国际天文研究再次贡献中国力量。

朱翠萍博士表示，相关数据库的建立不仅对于古籍挖掘、保护有重要意义，还可能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华书局古联公司作为专业的古籍数字化出版机构，希望未来可以更多地与相关领域专家合作，让古籍中的科学真正活起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出版成果云上展在烟台图书馆举行



本报讯 居家抗疫情，云上学经典。在七月七晒书节到来之际，烟台图书馆特别推出“《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出版成果云上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支持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组织编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之一，截至2020年底已完成编纂出版图书40种。这些典籍贯通古今，流芳百世，不断为中华民族提供丰润的精神滋养和智慧启迪。

《百部经典》力邀相关领域造诣深厚、对相关典籍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担任解读人。40种经典各具特色，凝聚着各位解读人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血，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本次展览将已编纂出版的40种《百部经典》介绍给广大公众，引领公众走近名著，阅读经典。

“《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主题展在广东省馆举行



本报讯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这部“世宏编卷帙浩繁、版式精美，却又命运多舛、屡遭浩劫。《永乐大典》的流散与聚合，是近代以来中华古籍保护事业的缩影。为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联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共同举办“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主题展览，于2021年8月至11月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展厅展出。

该展览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古籍与相关藏品为支撑，由“大典犹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遂使已湮得再显”“珠还影归惠学林”五个单元组成，生动翔实地展示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历程、体例及内容、流散与收藏、辑佚与相关情况、搜集出版与回归等情况。

展览遴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50余种文献，包括明清刻本、稀见清末民国印本，以及收藏于海内外十余家机构并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的《永乐大典》等，其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都较为突出。

《清远百岁老人档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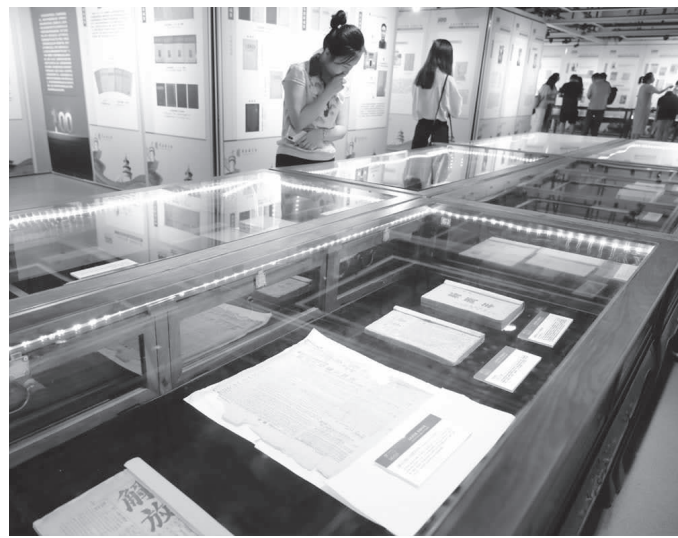
本报讯 百位百岁人，百部百年史。近日，《清远百岁老人档案》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图文并茂，生动具体，通过采访100位百岁老人，生动展现了清远独具特色的长寿生态和文化。100位百岁老人是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见证者，100年来他们经历了个体的悲欢离合与时代的变迁，同时也过上了幸福安详的晚年生活。100年的历史变迁，他们是深度的参与者、建设者及见证者，他们深刻体会到，是党的关怀让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书中介绍了100位百岁老人的养生经、“长寿秘诀”，向广大读者传递正确的生活态度及作息规律



及健康的生活理念。作为长寿老人，他们是伟大历史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而他们每个人的人生又是一部个人的生活史、家族的发展史，他们的故事值得娓娓道来，值得倾听和记取。 江水

图片报道



本报讯 “文载百年路，书写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川渝红色文献特展近日在重庆图书馆举行。据了解，重庆图书馆联合四川省图书馆，以两馆所藏的丰富红色文献资源为基础，精选出172种红色文献进行展览。展览中的许多红色文献、文物流传稀少，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此次展出的珍贵红色文献分为感悟思想伟力、党章宣誓初心、理论创新成果、讲述革命历程、繁荣红色文艺五个单元。

孙凯芳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日许昌市图书馆利用馆藏文献资源，在二楼综合阅览室开展设立“献礼建党百年，传承红色经典”图书专架活动。专架图书挑选了党史党建、廉政建设、河南红色历史、党的人物传记及革命战争等题材图书200余册。主题鲜明，内容翔实，为广大读者学习党史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粮。此次活动旨在方便读者快速、准确地选取阅读党政资料，满足其学习党史、提升自身政治素养的需求，积极发挥图书馆文化宣传阵地的作用。

郭莹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古籍与地方文献索引智能编纂探讨”主题讲座

本报讯 为推进古籍地方文献索引编纂的科学性与高效开展,近日,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国索引学会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共同举办“古籍与地方文献索引智能编纂探讨”专题讲座,特邀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索引研究所所长王雅戈博士主讲。讲座由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林锐主持,广东省图书馆系统、文博系统、高校系统、出版系统等60余名工作人员参加。

王雅戈博士长期从事索引研究和教学工作,参与撰写了索引标准《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2018年颁布),创建了中国索引学会创新实践基地,编制图书索引数十部,培训索引员数百名。

本次讲座围绕王雅戈博士主持开发的索引智能标引和索引排序系列软件进行演示。该软件通过直观界面操作,可对文档内容提取关键词,并根据需要按拼音、笔画、四角号码等不同规则进行排序、标引,极大减少了人

工排序的工作量,大大提高了索引编纂效率与准确率。讲座中,王雅戈博士还就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与会人员进行了探讨。

当前广东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中华古籍总目·广东卷》编纂工作逐步开展,索引编纂工作在此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次专题讲座的举办,对广东省古籍保护工作人员有所启发,进一步提高了广东省古籍目录编纂效率和质量。



图片报道



重庆市渝中区图书馆开展红色地方文献推荐活动

本报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渝中区图书馆资料部开展了红色地方文献推荐活动。

重庆作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之一,是一座被打上了红色烙印的城市。周恩来、董必武等党的领导人在这里与反动势力展开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杨闇公、周贡植等共产主义先驱者在这里用热血与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承诺;江竹筠、陈然等革命志士面对酷刑和屠刀坚贞不屈,在这里谱写出一首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而作为重庆母城的渝中区,正是这些共产党人战斗过的地方。位于渝中区大溪沟的中法学校,曾是杨闇公、吴玉章、冉均等人传播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基地;位于重庆化龙桥的红岩村,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位于重庆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的营业部……

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这些红色历史和红色事迹,让革命传统得以传承和发扬,北碚图书馆资料部在图书馆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开展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文献推荐活动,精选出《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党史大事记(1919-1992)》《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渝中区卷》《中共南方局研究文集》《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渝中区卷》(1922-2006)等四种有代表性的红色地方文献,并做了详细介绍。

这次红色地方文献推荐活动,有助于激发起广大群众了解重庆市和渝中区党史的热情,并为他们查找相关资料提供便利。

深圳图书馆五楼艺术设计区不久前推出“感受汉字魅力,传承中文之美——中国文字主题图书展”,这是深圳图书馆艺术设计区举办的第二期主题图书展。本期主题图书展主要展出中国文字史、书法、汉字设计等相关图书,让读者走进汉字的大世界,认识汉字、了解汉字,感受无处不在的汉字艺术的光芒魅力。 钟文汇

北碚图书馆有序开展民国文献编目工作



为了更好地保护民国文献,完成国家民国文献普查工作任务,重庆市北碚图书馆于2016年编制《北碚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保护计划》,2019年与国家图书馆签订《民国时期文献书目数据普查登记项目协议》。2020年在北碚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下,成功立项《北碚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保护计划》,获得专项资金编制五年计划,开展民国文献保护。2021年5月北碚图书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民国文献编目著录及回溯建库工作,截至目前已著录图书7万余册。

民国文献作为中华文明一个历史时期的载体,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民国文献指1912-1949年期间我国出版发行的各种文献载体,包括图书、期刊、报纸、照片、手稿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民国文献由于纸张制作工艺存在缺陷,酸化严重,部分文献一触即碎,因此民国文献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北碚图书馆自1928年建馆以来,收藏有民国文献18万余册,分为革命历史资料、抗战版文献、地方文献、报纸、期刊等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生活风情。其中所藏部分文献在全国范围内珍稀少见,尚有部分孤本。

本次民国文献编目工作预计9月底结束,北碚图书馆将出版《北碚图书馆藏民国书目提要》,读者可通过网上检索等方式查到书目。下一步还将逐步实施民国文献数字化,让读者可通过网络浏览部分书页,最终建成馆藏民国文献全文数据库。

《德清文学百年卷1921-2020》新书首发研讨会 在莫干山举行



本报讯 《德清文学百年卷1921-2020》新书首发研讨会近日在莫干山举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总结德清文学自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的发展历程,集中反映德清文学百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德清县作家协会在县委宣传部和县文联的支持下,启动《德清文学百年卷1921-2020》的征集、编辑及出版工作。其间,编委会发挥数字图书馆现代技术的优势,搜索作品信息并获取相应的数字资源,并从县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中找到了若干篇目。历时一年,该书终于问世。

德清县作协主席、该书主编杨振华说,征编过程需从众多报刊杂志上筛选出德清相关作品,而要联系的作家、作者又分布全国各地,不仅如此,对100年来优秀文学作品的梳理之举在德清县为首次,实属不易。此书出版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今后文学的传播、继承以及教学。

《德清文学百年卷1921-2020》分“德清作家集”“县外名家集”两卷,汇集了百年以来一百八十余位德清籍作家、文学爱好者及旅居德清、书写德清的外地名家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或获奖的两百多篇散文、诗歌、小说。其中,“县外名家集”收录了张抗抗、何建明、潘向黎、陆春祥、苏沧桑等县图书馆驻馆作家的作品。

活动现场,浙江文学馆、德清县图书馆等单位代表上台接受了赠书。《德清文学百年卷1921-2020》的出版,将以优秀文学作品诠释德清、鼓舞人民,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创造良好的写作环境,引导读者深入了解德清百年文学史。 姚剑虹

清县为首次,实属不易。此书出版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今后文学的传播、继承以及教学。

《德清文学百年卷1921-2020》分“德清作家集”“县外名家集”两卷,汇集了百年以来一百八十余位德清籍作家、文学爱好者及旅居德清、书写德清的外地名家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或获奖的两百多篇散文、诗歌、小说。其中,“县外名家集”收录了张抗抗、何建明、潘向黎、陆春祥、苏沧桑等县图书馆驻馆作家的作品。

活动现场,浙江文学馆、德清县图书馆等单位代表上台接受了赠书。《德清文学百年卷1921-2020》的出版,将以优秀文学作品诠释德清、鼓舞人民,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创造良好的写作环境,引导读者深入了解德清百年文学史。 姚剑虹

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的存藏利用

□陈红彦 吴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家图书馆收集革命文献的历史

根据档案记载,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的征集工作最早可以上溯自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愤日寇之暴行,不甘为敌傀儡”,带领部分馆员南下,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合作办馆。为了全面收集抗战资料,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联合组建了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在昆明、重庆、上海及香港等设办事处,兼有征集抗战史料的任务。

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还曾得到周恩来、林伯渠的支持。1939年4月10日,林伯渠通过李俨转交北平图书馆书籍50册。同年7月17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函付《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拂晓报》等书报数十种。这一时期,北平图书馆与延安解放社、延安新中华报社、延安新华书店等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机关建立业务关系,按期订购《解放》《中华》《新华日报》等革命书刊。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共早期革命文献和抗战文献得以公开入藏。

1946年底,在以叶剑英为首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北平前夕,北平图书馆曾向代表团征集书刊资料。从北京饭店中共代表团驻地提取赠书过程中,图书馆工作人员还被国民党特务盯梢,经过周折,这批书刊资料才运回馆内。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物的征集与保护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收集革命文物的通知》。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禁止出口的十一类文物图书中,第一类即为“革命文献及实物”。

20世纪50年代,北京图书馆首先提出了“新善本”概念。1952年底,冯仲云馆长责成专人创建并负责新善本手稿特藏库,还采纳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提出的三个人藏标准,即需具有思想性、历史性和艺术性,或据其一择选,但要着重在稀有罕见上。国家图书馆新善本的征集重点在革命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经过几代图书馆员数十载征集,加上社会各界人士的无私捐赠,国家图书馆藏革命文献总量已达13000余种18000余册(件)。

近年收集渠道

(1) 深入革命老区征集革命文献和实物。2011年开始,工作人员数次深入革命老区,征集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苏区红军标语、中央苏区红军多种通行证、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等珍贵苏区文献和实物。苏区文物存世稀少,是近现代文物中的稀有品种。从老区征集来源确凿可靠,是对馆藏革命文献的重要补充。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其后人捐赠。黎玉(1906—1986)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大量革命文献资料。2015年,黎玉家属无偿向国家图书馆捐赠7种革命文献。

石云山是原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前身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一名老战士,2016年,年届90的石老向本馆捐赠了

一批浙东革命文献,从不同侧面见证了浙东解放的历史。

(3) 海外文献回归。美籍华人陈灿培先生是知名的飞虎队文物收藏家,多次向我馆捐赠抗战资料和日军侵华史料,涉及书籍、传单、杂志、报纸、书信、票据、照片等各种类型。招思虹女士长期从事海外文物资料的抢救工作,多次向我馆捐赠。美籍华人阮益谦先生则向我馆捐赠多种家藏的抗战文献。海外文献的回归,丰富了革命文献的品类和馆藏。

(4) 合理使用经费,购置文献精品。近年征集到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著作早期版本,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选集》《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两条路线》,中共中央北方局编《抗战以来选集》《党的路线问题选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外还有一些印量稀少的伪装本也是通过购藏的方法采访入馆。

馆藏革命文献的主要内容

馆藏革命文献以图书、期刊为主,还有报纸、手稿、文告、档案、海报、传单等类型,涵盖了中图分类法22个大类中的17大类。成规模的有:

(1) 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时期的文献资料。如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南社社员入社登记的《南社入社书》;蔡锷签发的墨笔抄本《总司令部作战命令》;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社”的不定期刊物《觉悟》和由他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五四运动时期的著名进步期刊。

(2)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早期译本。国图藏有的《共产党宣言》早期中译本有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和徐冰译本、博古译本、陈瘦石译本、乔冠华校译本和谢唯真译校本。马克思的另一部理论巨著《资本论》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我馆收藏有陈启修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潘冬舟翻译的第一卷的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吴半农译、千家驹校《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以及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全译本。

(3)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如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抗战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现存《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最早单行本、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文件《二中全会决议》等。

(4) 新民主主义革命各历史时期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出版物。其中有很多中共领导人的早期著作版本,如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名著《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各种版本系统的《毛泽东选集》、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及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朱德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

(5) 国统区、敌占区刊行的进步书刊。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颇有影响的刊物《莽原》《语丝》《奔流》《新思潮》,以及“左联”成



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共产党宣言》专题展

立后,编辑出版的机关刊物《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研究》《前哨》等。此外,我馆还收藏有上海“孤岛”时期的珍贵出版物,如上海文萃社初版《毛泽东自传》等。

(6) 传世较少、形态各异的伪装本。如伪装为《新出绘图国色天香》的中共六大议决案,瞿秋白等主编、以《中央半月刊》《中国古史考》《平民》《新时代国语教授书》等伪装题名出版的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伪装为《文史通义》的毛泽东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等。

馆藏革命文献的保护利用

(一) 原生性保护

革命文献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产生至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所用纸张和制造工艺先天不足,历经战争炮火、天灾人祸、虫鼠危害,纸张酸化焦脆、纸质干脆、册页开裂、纸张掉渣等现象尤为严重,如果不能妥善保存,及时抢救,则终不免随岁月流逝而归于湮灭。

国家图书馆有国家级文献修复中心,革命文献的修复主要以抢救为主。国家图书馆还拥有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脱酸设备研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革命文献整体酸化严重,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开发和利用必将给革命文献的保护带来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避光照、防酸化、防灰尘,减缓藏品老化损坏的进程,是必要的保护手段,需要根据藏品特点配置相应的装具及保护设备。2015年,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完成并全部为善本书籍更换了新的封闭式木质书柜。2017年至2019年,在民保经费资助下,又定制、更新和维护了3000余套装具。

(二) 再生性保护

为了减少革命文献的反复提存和翻阅,减缓其物理损坏,同时又要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国家图书馆很早就有对革命文献进行数字化的设想。2006年,曾对馆藏革命文献中红军时期的文献进行数字化扫描,藉此对这部分文献进行初步摸底。由于文献的开本大小、装订方式、保存状况差异较大,破损、夹字、透字、酸化焦脆、皱褶、毛边未裁等问题较为突出,数字化计划遇到阻碍。2019年,馆藏革命文献的数字化工作再次启动,目前这部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三) 利用

1. 出版。近年来我们根据革命文献的

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和版本特点,和出版单位合作,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毛泽东著作早期版本图录》《名家手稿暨革命文献善本掌故》《钢铁长城》《红色记忆》《文艺的灯塔》《艰难与辉煌》等一系列揭示革命文献内涵、弘扬革命文化的书籍。

2. 研究。2012年起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B卷)》的研究工作,2019年开始参与由中宣部指导、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的出版项目《鲁迅手稿全集》,将在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完成。此外还申报有《民国时期革命和进步期刊汇编》《国家图书馆藏解放区教育文献汇编》等多个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等。

3. 展览。近十年来,国家图书馆运用高科技手段和新颖的展陈表现手法策划了“钢铁长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馆藏文献展”“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馆藏文献展”“文艺的灯塔——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馆藏文献展”“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馆藏珍贵文献展”“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白山黑水铸忠魂——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馆藏东北抗日联军珍贵文献暨冯仲云手稿展”等一系列大型公益展览,目前正在进行《共产党宣言》展。社会反响热烈。

4. 服务。国家图书馆持续地为国家机关和科研单位提供阅览和咨询服务。加强与其他收藏单位的合作与交流,近年来为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局、毛主席纪念堂、延安革命纪念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蔡锷故居等文化机构的展陈展品和复制服务,更加有效地发挥馆藏文献的作用。

革命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革命文献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也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用文献说话,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烈故事,传承革命文化,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去探索实践,我们愿意与各界同仁共同努力。

对“书院热”“国学热”的冷思考

□陶奎(日照市图书馆)

中国传统的书院,具有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保存书籍、社会教化等综合功能。书院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过程,明清是书院空前繁荣的时代。民国时期,儒家知识分子梁漱溟、马一浮等人也陆续兴建过复性书院等书院,使书院文化得以延续发展。

物极必反,近年来,忽如一夜春风来,“书院热”“国学热”如雨后春笋,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大江南北迅速掀起热潮,并且呈现不断升温之势。五千年的文明史,璀璨的中华文化是民族瑰宝,必须十分珍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封建理念,封建传统,始终如影随形,直至今天也没有彻底根除,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文化是有阶段性、时代性的,要用历史的眼光批判地看待国学。因此,在充分肯定“书院热”“国学热”现象的同时,应当对其存在的负面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并探寻解决之道,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健康传承与发展。

据此,笔者不揣浅陋,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抛砖引玉,共同参与研讨。

不可忽视的倾向

“山寨书院”“泛国学化”现象严重。目前,到处是某某书院、国学馆、国学班、国学书屋、书院专栏、书院讲座、国学讲堂、国学培训、国学读物等等。新闻媒体、各类印刷品上到处都充斥着“国学”一类字眼与称谓。像唐诗宋词、四大才子书、《百家姓》等普通读物,其封面上也印着“国学”字样。似乎只有印上“国学”二字,人们才知道那是中国人的作品,才能凸显其重要性。有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竟自建书院,仅仅是教小朋友读《三字经》《百家姓》之类,也自称是“书院讲师”“国学老师”。有些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在其门面上赫然打出“国学书院”的招牌。形形色色,喜忧参半,不一而足。

“山寨书院”“国学大师”帽子满天飞。有的地方挂块匾就是书院,穿上唐装讲了个民间传说故事、拍了个小视频,就被包装成了“国学大师”。有的人动辄把某某文化工作者或者某些书画爱好者冠之以“书院名家”“国学大师”头衔。更有甚者,有的人连普通的文言文都读不懂,连“之乎者也”的基本含义都弄不明白,更不用说什么是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宾语前置、通假等基础知识了,竟然自诩为“国学大师”。此类现象之多,不胜枚举。

传统书院文化、国学教育渐渐走向庸俗化。据网上信息,某省一学校,几百名小学生统一着古装,整齐划一地跪在大操场上,对着孔子巨幅画像行磕头礼,美其名曰“国学教育”。试问,这究竟是先进,是落后?是进步,是退步?如此这般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是怎样的人才?换言之,究竟要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怎样的人才?这样的“国学教育”不禁令人担忧,这样的“国学教育”必须引起我们的思考。

书院沦为商业的附庸。有些单位或个人为了吸引客户的眼球,高举“书院”的招牌,打出“国学”的旗号,用“国学”进行装潢。其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追逐商业利益,达到赚钱的目的。至于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真正含义是什么,没有多少人深入探究。有的人为了成为“网红”,到了录制视频时才把背景、服装道具等打上“国学”字样,大加包装。等到节目录制完了,那些“国学”包装物就被弃之不顾。如此做法,弘扬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已经荡然无存。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提倡,人们在讲“同情理解”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内容的检讨与反省。从这一点讲,提倡批判精神仍有其积极意义。

封建思想有回潮之忧。有的地方建起了什么“女德班”,让清一色的女孩子单独编班,接受所谓“女德”书院教育。有的地方竟然把“三纲五常”堂而皇之地搬上讲堂,向学生灌输。稍有历史常识的人

都知道,历史上的所谓“女德教育”,其实就是教育女孩子接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是典型的封建礼教。“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就是典型的封建主义。早在一百年前,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就被批得体无完肤,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到了21世纪的今天,竟然有人再把那些封建垃圾当做宝贝,奉为经典,并且向下一代大加灌输。为害之大,发人深思,令人警觉。

对策与建议

上述现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明确概念,正本清源。什么是“书院”?什么是“国学”?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需要很好地探讨,全面地理解。古代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道场,是儒家信仰者的精神家园,书院担负着弘扬、光大传统文化的责任。“国学”也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综合《辞海》《词源》和《中华大字典》等方面的诠释,“国学”就是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也可以说是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所以,胡适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国学”如果作为一个概念,其外延极其宽泛。纵向来说,上自先秦,下迄当代,纵贯五千年。横向来说,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科技、宗教,等等,所有的学术文化无不包括在内。涵盖面之广,超出多数人的想象。这其中,名人名家灿若繁星,数不胜数;名文名著浩如烟海,不计其数。显而易见,当前轻率滥用“书院”“国学”概念之“热”应当降温,应该根据情况适当限制。

第二,批判地继承。对于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必须继承并发扬光大。但是决不能囫圇吞枣,把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封建糟粕奉为至宝去宣扬灌输。以人们熟知的“三纲五常”为例。如果说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五常”尚有可取之处,那么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内容的“三纲”的确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应当坚决摒弃。即使是许多人经常挂在嘴上的儒佛道三家,其理念中也是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并存。儒家的孝敬谦恭,佛教的抑恶扬善,道家的崇尚自然,都是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但在另一方面,佛教的“生死轮回”是唯心主义,道家的“长生不老”是自欺欺人,儒家的“恢复周礼”是拉历史倒车。孔孟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百年来早已被反复批判。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再去照抄照搬,不加选择地一味宣扬呢?对于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现象,正确的做法是有分析,有批判,有选择,有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传统文化应“从历史中走出来”,并与时俱进发展为当代的新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使民族文化精神得以延续、发展。

第三,革故鼎新。《礼记·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历史上每当利弊日久时,总会有改革和革命运动,为清除积弊而变规变法,如北宋时王安石变法,清末时康有为、梁启超维新都体现了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靠着上述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奋发进取,战天斗地,百折不回。这种精神成就了光辉灿烂、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惟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生生不息。厚德载物、海纳百川,使中华文化既有独创性,又有兼容性;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丰富多彩,百花齐放。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的哲学思想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确实有很多东西是值得继承和弘扬的,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自强不息的奋斗、厚德载物的宽容以及“仁爱”精神、“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律己观念、“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处世原则等。在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还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社会生活都面临着过度物质功利化的问题。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发生了偏差。然而人作为人的存在,还应是以智慧、德行和审美情趣为表现形式的文化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为基础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为现代人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因此,我们要主动、积极地阅读文化典籍,欣赏文学作品,考察文物古迹,真正了解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将文化精华化为我们的良知、理性、美感等主体存在的一部分。还应该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判断、文化心理中自觉以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要求自己,做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积极弘扬民族文化、宽厚仁爱、有创新意识的中国人。

第四,实行“顶层设计”,抓好在校教育。主要是在学生课本上适当增加文言文和古诗词的比重。对于那些经典文著,从中小学到大学课本都要适度增加。增强学生对于文言文和古诗词的阅读能力、认知能力和写作能力。由此延伸到高考、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招聘,其中语文试卷的内容自然而然地增加了我国传统文化比重。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假如没有这一条,所谓“弘扬中华文化”就成为空中楼阁。

第五,开展全民阅读,增强国民文化素养。纵观世界,凡是发达国家其全民阅读水平往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反之,凡是发展中国家其全民阅读的水平普遍较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以政府投入为主,民间积极参与,大力增加图书馆、城市书房、社区书吧、庭院书屋等阅读场所和设施。这些硬件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各有关机构应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大力推动,形成广泛持久的全民性读书

活动。当全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之后,对中外思想文化中的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自然有了辨识能力。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现象可迎刃而解。

第六,切忌以道德说教取代法治教育。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凡是早早实行法治的国家往往率先成为发达国家,凡是实行“人治”的国家无不是落后挨打的国家。法治的重要性毋庸赘述。须知我们的祖先(含名人在内)其法治意识是相对淡薄的,更没有形成完备的法理学理论和系统的法学著作。这是历史性的缺憾。大家都知道,道德是弹性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更不具备“硬约束”的特性。而法律是刚性的,是全民最高行为准则。所有官员、公职人员和全体公民都要一体遵守,违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欲求安邦定国,国富民强,必须是依法治国为先,辅之以思想道德教育。二者主次分明,不容颠倒。

第七,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如上所述,中华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源远流长。绝不是只有孔子一人或者儒家一个学派。不能把孔子和“国学”划等号,也不能把儒家学说和中华文化划等号。当然,不可否认孔子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西汉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名人荟萃,名家辈出。孔子之前和孔子当世,已经是诸子争辉,百家争鸣。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历朝历代名人名著数不胜数,各种流派异彩纷呈,才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因此,弘扬中华文化,应该是弘扬所有的优秀文化,不是仅仅弘扬孔子一人文化或者儒家一家学说。同时,要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应该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取人所长,补己之短。不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更不能抱残守缺,排斥先进的东西。

结语

2015年以来,山东省文化厅利用书院这一古老的招牌,在全省创建“图书馆+书院”新文化传播模式,在全省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开展公益讲堂,教化大众,通过举办经典诵读、国学普及、礼乐教化、道德实践和情趣培养等活动惠及广大市民,积极发挥了公共图书馆的文化阵地作用,不仅“为往圣继绝学”,更重要的是“为往圣继新学”。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指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在对本民族人文文化的认同程度。缺少人文精神的民族最终会走向虚无、走向异化。惟其如此,才能有效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使中华文化永放异彩,使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傲然屹立。

李大钊珍贵演讲影像及相关文献研究

□韩爱先(山东大学图书馆)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07年考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1913年在汤化龙的资助下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日期间,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迅速传遍了全国,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4年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了《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对中国前途流露出了悲观的情绪。为此1915年26岁的李大钊写下“厌世心与自觉心”,不苟同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呼吁:“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随之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此时的李大钊预感到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宜再造而不可缓。1916年回国后不久进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是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之一,对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0年在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多个学生进步社团。李大钊是中国最早表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人。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革命青年的思想领袖和导师,是卓越的革命演讲家,是中国哲学史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来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第一个哲学家。陈独秀曾经真诚地说过:“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如此伟大的举足轻重的人物,赴难时年仅38岁,留在世上的照片仅有20多张,时隔多年声像资料因战乱国内未见有收藏,诚为憾事。

影像不负寻找人

1999年在李大钊诞辰11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拍摄电视文献纪录片,这一任务落到纪录片专家阎东头上,他希望通过专家挖掘出一些新的资源,于是拍摄组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学者李玉贞。这位研究李大钊的专家说:“李大钊曾经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过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或许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里还存有当时的资料。”9月初李玉贞恰好接到来自莫斯科的学术会议邀请函,她带着中央电视台不惜一切代价把李大钊在苏联活动的文献带回来的重托,赴苏联档案馆这个有无限吸引力的金矿淘金。李玉贞精通俄英两国文字,找到了当时陈独秀委任李大钊去参会的委任状,那是写在白绸子上的英文书信,但没有找到电影胶片。几次寻找未果,李玉贞又扩大了搜索范围,根据俄罗斯专家提供的重要线索立即前往莫斯科郊外的档案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经过四个小时终于查找到一张年代久远的影像卡片索引,上面是手写的“李大钊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发言”。李玉贞翻阅卡片的手有点颤抖。

时隔多年,找到李大钊唯一一段生前活动影像,李玉贞万分激动。她急切地拨通了闫东的电话:“……没错,我看到了李大钊的名字!”按莫斯科郊外档案馆的规定,调一盘胶片查阅需花费40美元,如果转录一分钟影像资料需要花费700美元。闫东通过国际台的记者把钱交给了李玉贞,李玉贞再次到电影资料馆,精心选择了69秒的电影胶片,并诚恳地请档案馆给与优惠,馆长被打动了,按700美元的价格转录了李大钊迄今唯一被发现留在世上的胶片档案。这段珍贵的35毫米电影胶片记录的是1924年9月22日,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大会。站在舞台上身着中山装(类似)的李大钊,看上去容光焕发,他的精彩演讲不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场的苏联摄影师清晰地记录下这些历史画面。由于当时拍摄技术的限制,我们看到的虽然是无声影像,但李大钊演讲时动情的神态和豪迈的动作填补了历史空白。

李大钊的影像被找到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反响:一是因为他对建党贡献大,二是因为死得悲壮,三是因为救义以后六年才被公葬。他在北大图书馆首先引进《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等进步著作,不仅是名副其实无与伦比的荐书能手,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阅读推广达人。此外,成立亢慕义斋研究、翻译、演讲、交流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从软件或硬件上都极大地方便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积极投身到发动群众的革命实践中,亲自组织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办报刊、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亲自散发传单,亲自上街游行,亲自同警察搏斗,可以说他

是顶天立地扎根在泥土里,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中国社会的第一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艰难不易,多少人铭记在心……

感谢当时的摄影师,感谢莫斯科郊外档案馆不辞辛苦的保存,感谢中央电视台闫东摄制组,感谢李玉贞教授不负重任把李大钊演说视频成功复制带回国,要不然我们对伟人的印象只停留在初中课本里那张平头头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了缅怀先驱的壮举,在中央电视台及各大新闻媒体公众号,陆续推出了一些李大钊短视频。伟人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挥斥方遒、激情演讲的生动画面,打动了无数网友。清晰、动态、亲切、平实、立体,虽然距离1924年9月22日演说已经97年了,但通过视频好像先人正在近距离面对面地在演讲。看到共产党创始人真实感人的魅力,不少网友留言:“这是什么时候的视频?这是什么场合?在场欢呼和鼓掌的观众是谁?李大钊演讲说了什么?”相同的感受和一系列的疑问也萦绕在我脑际,于是我找来《李大钊选集》《李大钊研究论文集》《李大钊全集》一到五卷,如饥似渴地研读,希望通过有关文字的记载,来揭秘这段珍贵视频相关的故事。经过四个多月的挖掘梳理,现分享如下:

李大钊在莫斯科的经历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李大钊以强烈的震撼,他对十月革命经历了关注、思考、逐步认识并进行热情颂扬四个阶段。他对祖国的爱、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及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使他第一个洞察到十月革命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定于1924年6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而此时李大钊正在其家乡乐亭昌黎的五峰山韩文公祠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1924年5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李大钊最后一次来到五峰山。不久,他接到作为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通知。时值北方党组织经济拮据,筹措所需款项十分困难,经和党组织研究,决定请杨扶青的“新中公司”予以资助。李大钊在赴哈尔滨途中,于昌黎下车,杨扶青立即亲笔写信给新中公司哈尔滨分庄,请付银元五百元,并掩护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

一行人直到6月下旬才抵达莫斯科。而此时,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他们总算赶上了正在进行的会议。《李大钊选集》里收录了作者《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的同情》一文。里面写到:“自满洲里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云霄,火车行于长林丰树间,入眼均有郁苍伟大之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令李大钊耳目一新、心旷神怡,一进入其国境,就对映入眼帘的景物有了超乎寻常的审美。

“自满洲里来莫斯科,约经7昼夜可达。……抵莫京时,正值全世界五十余个

民族的共产党代表集于此赤色的都城,参与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们与弟相值,辄询及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广东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颇有一种诚敬的钦感及浓厚的同情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段描写可以看出,当时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是一次世界性的各国共产党员代表的一个峰会,苏联广大民众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关注、关爱是发自内心的。

“前晚在大剧院又有数千人的集合,英国共产党领袖马克曼努斯及中国、法国、美国、日本的共产党代表均出席演说。……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在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及军阀战斗……”这篇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文章中,“英国共产党领袖马克曼努斯及中国、法国、美国、日本的共产党代表均出席演说”这句令人产生疑问。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中共代表还有罗章龙、王荷波、刘清扬,另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赵世炎等中共党员。文中一笔带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发表了演说,没有明说是谁发表的演说,谁是这些代表中的首席代表呢?

在《李大钊研究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里发现了李葆华(李大钊长子)在《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一文中有这样的记叙:“那时父亲正在苏联,他是五月里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至此,我们产生的疑问可以打消了。“大会结束后,其他代表先期回国,父亲在苏联又逗留了一个时期。他到各地参观、访问、考察、讲演,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俄文。在苏联期间,父亲给家里来过几封信。他那时化名“李琴华”。父亲曾写信向家里要一件皮大衣,看来他是打算在苏联至少过了冬天再回国。”在苏联期间,李大钊还如往常在国内一样保持朴素生活,着普通衣,穿桦皮鞋(苏联人以桦树皮做的便鞋),自己打扫房间。他接待各国来访客人,经常谈至深夜,待客人走后,再继续埋案撰写文章。

李大钊是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发表演讲的非他莫属,那么他演讲时说了什么呢?

1.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演讲。

1924年9月22日,李大钊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700多字的演讲。当时的背景是,1924年8月孙中山为了制止广州商团暴乱采取了措施,不久英国政府表示如果镇压商团他们将全力对付。对英国政府干涉中国的行径,国内兴起了反帝群众运动。在此情况下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李大钊发表演说道:“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大舞台。中国人民在受着帝国主义和政治上的影响。中国农民丧失了土地和生产工具,

他们目前的境况十分危急……”“……你们,莫斯科的男女工人们,组织起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愿你们积蓄力量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定会争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在李大钊富有说服力、感染力、实事求是、目的明确、逻辑严谨、情感丰满的简短发言中,表达了“中国问题不单是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研究李大钊在苏联的演讲词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这位拥有全球政治头脑、世界文化眼光的爱国者的雄才大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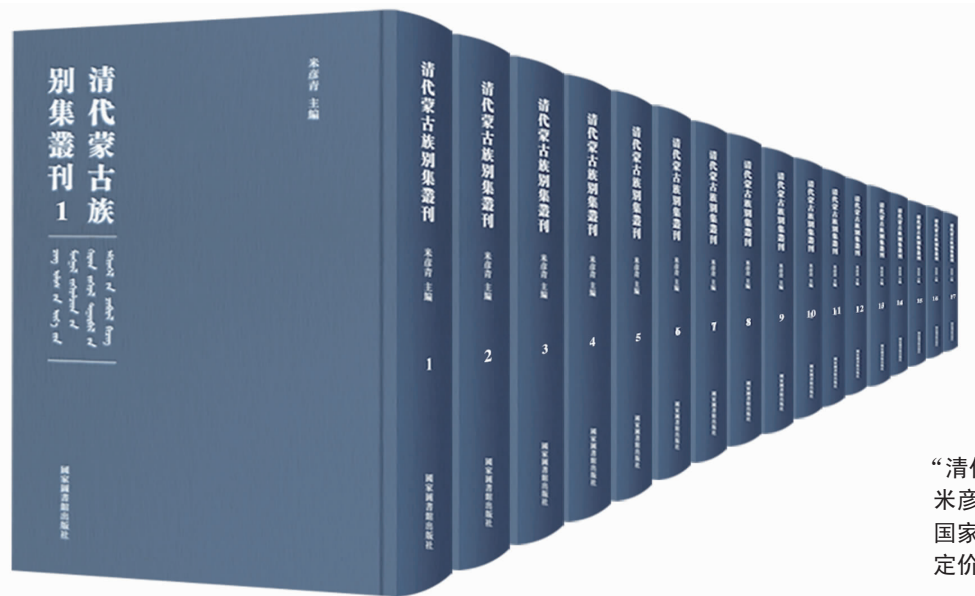
2.在中共旅莫支部做报告。

李大钊在苏联的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了10余篇报告,有时去参观孤儿村的生活,有时接受《消息报》记者有关中国内战的谈话,有时去参观工厂,有时给东方大学中共党员作报告……东方大学是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简称,1921年10月建于莫斯科,1924年的1015名学员中,中共党员占9%,即有90多位进步青年在该校学习,研究中国问题。1924年10月30日李大钊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第七次大会上的报告为《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在这篇报告里李大钊说:“……国民革命的真正分子除了中山外,只有一二人,其余只有我们了。然而,我们的党,又很幼稚,人数又很少……我们来此是学习革命的,并不是留洋留学求博士的。我们的责任这样的重大,所以我们应以团体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团体。”读到此我仿佛看到他双手支撑在讲台上和青年人循循善诱像拉家常一样,以他极端个性化的诚实的语言和结构来“客观地”诉诸现实和社会。他的报告是真诚的内心化成的文字,能使听众与报告人产生亲近感、亲切感。其报告的独特之处在于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叙述基调。我们在阅读他报告内容的时候,他的工作态度、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心中只有敬意。李大钊这位令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报告人,才是人们应该真正圈粉的明星。

永远青春偶像

“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为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这是李大钊1916年8月15日发表在《晨钟报》创刊号上振聋发聩的文字,也是2020年新冠疫情背景下,北京大学一位穿红色衣服的女同学帮不能到现场毕业的同学给校园内李大钊塑像献花完成毕业心愿时咏诵的话语。其敦敦教诲在青年中产生的影响言犹在耳、流传至今。

“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全四十册)出版



“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全四十册)
米彦青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3月
定价:35000.00元

本报讯 由米彦青主编的“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全四十册)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元明清时期,蒙汉民间交融最为密切且逐步走向深化。大量的蒙古族文人写作汉语诗文,以诗文集或散见于别集的形式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蒙汉文学交融文献。基于现存的诸多未加系统整理的文献资料和长久以来对此研究领域的深入探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米彦青,于2016年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176)。此为其中子课题成果,编为“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成书四十册。该书收录80余种蒙古族作家的诗文集,其中抄稿本18种。此书的出版,用文献展示了清代蒙古族文学创作的独特面貌和发展历史,准确描述了蒙汉文学文化的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了蒙汉文学交融的亮丽风貌,为建构系统完整的清代蒙汉文学交融文献学术谱系提供了可能,进而为建构中国古代蒙汉文学交融史奠定了文学文献基础。

主编米彦青,女,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是唐代与清代文学及元明清民族文学研究。

中华民族史料的编纂适逢其时

□额尔根巴雅尔

“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是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米彦青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扶持人才团队”项目“蒙汉文化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内蒙古“草原英才”滚动工程产业创新人才团队成果,由内蒙古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感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给予大力支持,使丛刊得以按期出版。

2019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古大学,听取学校建设发展、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思想政治建设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在考察蒙古文古籍文献展阅室时强调指出:“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了深入贯彻总书记指示,我校在古籍文献整理、挖掘、研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我们要充分挖掘古籍文献当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推进民族团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古籍文献当中,民族团结、各民族文化交融方面的内涵丰富。当下,我所在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同历史学、民族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等学科,正在协同攻关,共同挖掘文献中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推进民族团结。纳入双一流建设,推进“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的出版,正是这项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蒙古族从13世纪开始大量借鉴汉族优秀文化,从18世纪起翻译四大名著,吸收并借鉴汉语小说结构体例。目前,各类图书馆馆藏诸多四大名著不同的蒙古文翻译版本,充分说明当时四大名著在蒙古族地区传播情况,这是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有力证据。

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积极交流与融合,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发展带来层次丰富的变化。元明清王朝出现的民族融合是产生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土壤,蒙古族的汉语创作在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大量的蒙古族文人创作汉语诗文,作品以别集形式留存后世,这些作品是蒙汉文学交融的经典文献。

在长时间对此领域探索研究的基础上,米彦青教授于2016年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176),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目前项目进展顺利,成果产出丰厚,“元明清蒙古族别集丛刊”就是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课题组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对国内高校及公共图书馆进行摸排式检索核校,逐步系统搜集整理了元明清三代的蒙古族别集。因清代部分诗文集留存数量最多,且从未被整理过,文献价值最大,所以先期出版了“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

据我所知,清代蒙古族有诗文创作者近百位,其中五十多位有完整的别集存世。现存别集形态不一,其中稿钞本三十余种,余者多为刻本、铅印本等。本次刊印选书以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八十七种为底本,校以其他图书馆藏本。其中四十二种未曾面世,内含孤本二十二种。

晚近出版业发达,此期蒙古族文人汉语诗文创作更盛,留存的作品亦多,且大都存在重刻现象,一种别集出现两三个版本的情况较为多见。但即便是相同版本,也因种种原因附载的信息不尽相同,需要对多个版本进行甄别,以对清代蒙古族别集进行最全面的梳理。因此,“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的影印出版,不仅有助于提高钞本的保存,更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提

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清代蒙古族作家大都官位不高,诗文创作水准相对较低,既有的很少被提及,所获得的关注度较为有限。但从中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中蕴含诸多民族团结、蒙汉文化交流交融的论据,能够有力证明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交融是在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

作为一名古代文学研究者,我历来主张文献学与文学研究的真正融通,把资料的全面搜集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考据方法与意义探究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华文学中,蒙古族的文学创作是引人注目的,元明清蒙古族曾刊行了《雁门集》《谷原诗集》《存素堂诗集》等上百部诗文集。要对这些诗集的版本、诗作真伪等诸多情况进行系统考证,纠正其中的舛误之处,在对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严谨精密的考据和科学整理的基础上,对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展开研究,再现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的历史过程,加深对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理解,是课题组这几年致力而为的工作。“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的出版,就是用文献展示清代蒙古族文学创作的独特面貌和发展历史,描述蒙汉文学文化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蒙汉文学交融的亮丽风貌的明证,这样的文献为建构系统完整的清代蒙汉文学交融文献学术谱系提供了可能,进而为建构中国古代蒙汉文学交融史奠定了文学文献基础。

“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的影印出版,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发掘蒙汉文学交融的历史过程,揭示蒙汉文学交融在中华文学精神和中华文化传统生成中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社会意义。